

· 著名学者与藏书 ·

顾颉刚藏书记（上）

顾 洪

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于 1980 年 12 月逝世，根据其“藏书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的遗愿，家属将其藏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 年先由历史研究所代管，1988 年由文献信息中心（当时称文献情报中心）正式接收，成立“顾颉刚文库”。内存线装书约 6000 部，3.6 万余册；平装书约 2600 种，1 万余册，共计 4.6 万余册。现已将线装书的编目工作完成，整理编辑为《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其中属于珍善本古籍、抄本、稿本约占 1/10。先生生前考虑编辑自己全集的同时，多次提到要把藏书整理编目，出一本目录。1957 年计划编纂“缓斋藏书记”，归入全集“生活类”。他说：“予一生好藏书，其中艰苦非他人所知，且得到若干孤本，必当自定一目录，并略为记叙，庶不埋没一生苦心。”（1957 年 7 月末日记）可惜没有及身作成。我们仅就多年在文库的工作，简要介绍先生藏书的经历和文库的特点。

（一）

先生一生藏书大概可分为五个时期：1. 初始期，即从幼年到 1916 年。2. 积累期，即 1917 到 1926 年。他有一方藏章为“颉刚丁巳后所得书”，丁巳为 1917 年，这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也是

先生始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的一年，可以说是他一生致力于疑古辨伪事业的开始。3. 鼎盛期，即1927至1937年。另有一方藏章为“民国十六年后顾颉刚所得书籍”，也很耐人寻味，1927年4月他作为中山大学教授，被派往江浙一带为图书馆购书，这时他写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简称《计划书》，1981年重刊于《文献》第8辑），图书馆专家杜定友认为其中所“拟的十六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添减”，因而被图书文献专家称为“对图书馆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见顾廷龙文，详后说明，下同），说明此时他的藏书宗旨完全符合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这一时期主要在燕京大学讲学和作研究，生活相对安定，收入较丰，藏书达到10万册之多。4. 散佚期，即1937到1945年，在抗日战争中藏书损失巨大。5. 重聚期，从1946年到逝世。下面依次说明。

1. 初始期

先生出生于苏州的一个读书世家，自幼酷爱读书，很早就出入玄妙观书肆，把长辈给的压岁钱、零花钱积攒下来买书。生平所买的第一册书为《西洋文明史要》，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只有10岁。文库现存数种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购书，如江湜《伏菟堂诗录》，题“光绪戊申，铭坚以小洋角半得之于旧书铺”；陈宏谋辑《五种遗规》，题“光绪戊申，铭坚以小洋三角五分购于观中觉民社”；俞樾《群经平议》，题“戊申夏日铭坚以小洋角半得于觉民社”；袁枚《小仓山房文集》，题“戊申夏以银元三个购于大成山房”；司空图《诗品》，题“光绪戊申，铭坚以铜元四枚托彭君英标购于临顿之敬业书坊”；《唐六如画谱》，题“光绪戊申，铭坚以青蚨七十枚购于观中书铺”等等。它们多是清末坊刻本或石印本。这一年他15岁。在《咫进斋丛书》本郑珍《说文新附考》前，有他1965年题识，谓此书光绪五年出版时，祖父即得之，而缺卷四第七页及卷六第九页，于是借他人藏本补抄。“当光宣之交，

予爱游书肆，归来辄有所挟，吾祖训之曰：‘购书亦不易，先须检查有无缺页，然后可读。’六十年来，言犹在耳，而我贪多务博，得书虽多，终无暇检也。李贻德《左传贾服注》一书，吾祖得之而缺一册，即手抄一册，尤为予小子所望尘莫及者。”

他的祖父喜爱金石和小学，父亲喜爱文学，叔父喜爱史学。同学中，王伯祥喜爱史地书，叶圣陶喜爱诗词文集。先生兴趣广泛，又受他们的影响，四部书无所不收，并把购来的《四库提要》、《彙刻书目》、《书目答问》等定为专业课本，长日浏览，目录版本之学由此益熟。明清人书刻于何时何地，一见即可知其大概，“是时虽在青年，亦宛然有藏书家鉴赏之风度矣”（见《〈书巢〉后记》）。有一年，为买书负债竟至二百元，不敢向家里要，就在同学中借。那时并不想将来如何还债，只要带回家，抚弄一番，也就心满意足。故有许多书，年底结账时拿不出钱来，依旧还给书铺完事。进了中学，托人到上海买了前三年全份的《国粹学报》，在校翻读竟忘记了考试，被监学先生斥责一顿。16岁时，在书肆看到《惜阴轩丛书》，归检《书目答问》，发现其中多应读之书，急与书贾侃价，至银元18枚不能再降，由于手头钱不够，每天缠着祖母，“尽许平时所不肯应之督责以求之，而是书遂灿然列于架上”，这是他平生所购丛书之始。而后再看顾修《彙刻书目》，知道丛书的内容更多，“坊肆间有所见，往往可以不翻其书而指数其目，虽都未能享有，亦聊以之自慰焉”（见《丛书子目类编序》），心情比之于初见《惜阴轩丛书》时，平静多了。

辛亥革命后北上求学，眼界大开。京中书肆集中在琉璃厂、隆福寺，名著佳刻连屋累栋，凡以前闻其名而求之不可得者，现皆具备，只是身为穷学生，无力购买。因而时时光顾地安门、东华门及宣武门内地摊。去年发现1915年他编的《京舍书目》（简称《京舍》），记录了1903年至1915年的藏书。其中1913至1915三年间所购戏曲小说杂志，大约多是在地摊上买的。下面依据此书

目，对他的藏书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这一时期藏书的特点是博。从《京舍》的著录可知，他在1907年购有光绪末年出版的日本人编著或印刷的《东洋史》、《西洋史年表》、《东洋史年表》、《地文学》等新书。1908年入苏州公立第一学堂，买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二编》。1909年所收多为笔记小说，如《浮生六记》、《陶庵梦忆》等。1910年买了数十种江苏师范学校讲义，有《易》、《诗》、《书》、《礼》、《辨学》、《心理学》、《中国历史》等，有几种现存于文库，可以窥见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教材建设。1911年购买英文外国文学书和历史书较多，大都是中学课本，自然科学方面以算学类课本最多。现存文库还有一两种，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后都捐给上海合众图书馆。1912年从中学借得《东洋历史地图》，非常羡慕日本人编制地图的成绩，“独恨中国犹无能依据摹仿之人耳”（见《京舍》），这恐怕是日后发起禹贡学会、绘制历史地图的最初动力。1913年进北大预科，经常出入戏场，买了不少剧本及旧小说，还有齐如山的《说戏》等研究和介绍戏剧之作。1914、1915两年买书最多，反映他所谓“予甲寅（1914）秋冬，立志励学”（笔记《馀师录弁言》）的情景。购有《史通通释》、《文史通义》等“平议”类书及《老》、《庄》、《列》、《荀》、《韩非》等子部书籍。章太炎的《庄子解故》，是他十分敬重的预科同学毛子水出资排印的，共印500部，止行于学校。还有各种中外杂志、西方哲学类教科书、佛教书籍以及新旧约《圣经》等，反映了他欲打通佛、耶、先秦诸子，寻求对“何者为学”、“今日之学当如何”等问题的思索。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开始了解今文经学。这里特别应提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吴人达翻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户水宽人的讲稿《尧舜时代之制度》，此书被他保存下来，在原书和《京舍》中都写下内容大致相同的批语，《京舍》中写道：“著者本非经学家，故不能责其详备，而留学界已惊若重宝，急为译出，而

于数百年中完备之经学反若无睹。徒持物竞天择之说，腾而狂趋，其志虽可称，其学则弗足道矣。”预示着日后对古代传说的研究及与日本一些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

由《京舍》还可知他的祖、父、叔的一些藏书亦被他带到北京。值得一提的是他父亲的读书范围已相当广泛，像日本人的《哲学要领》、《东洋史要》、《欧亚大地图》、严复译的《天演论》、纪昀评的《史通削繁》及《文心雕龙》、明孙穀的《古微书》等，他都很重视，有些还在往返于北京苏州时随身携带。此时他对纬书已很留意，感到“杂糅无谓之书，莫过于纬矣”（笔记《乙舍读书续记》）。30年代任北大教授，欲整理纬书，当时历史系学生张福庆（季善）有志于此，他便将自己搜集的纬书资料交给张，指点张去做。因此他从父亲那里引起的关注，绝不可小视。如果把《京舍》著录的现存于文库的60多部书统计一下，属于“祖父训读”、“父书”、“父读”、“叔书”、“叔读”的十多种，其中属父亲的最多，占9部。

《京舍书目》作成之后，他给同宿舍的朱孔平看，并不无得意地说：全校一千多学生的藏书，“杂莫甚于我矣。盖我所携之书，旧学中无类无之，虽小说戏词，均所不弃。即最厌之类书、字汇亦有。西学虽不全，亦十得五六，虽不能读之算学理化，其书亦多”（笔记《乙舍读书续记》）。他认为对于学问，“宁其不精，不可不博。精，他日学成之事也；博，今日始学之事也”（笔记《乙舍读书记》）。在《京舍》最后一页他还记道：“拟刻一印曰：书之宝玉，戏之九方皋。”这里当指《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淮南子》等书中善于相马之九方皋，很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先生读书、藏书所追求的境界。

2. 积累期

由于后来先生再没有专门编订像《京舍书目》那样综合的藏书目，因而无法详细地记述这一时期每年的情况。但从各种记载

中，仍可得见他的藏书概貌。

1918年8月，吴夫人病逝；9月，由叶圣陶、王伯祥介绍续娶殷夫人。滞留苏州半年中买书1500册，约值200元，在悲伤的心境中以翻书求得乐趣。“内先妻的遗产70元，储蓄会奖40元，月费20元，开账20元，欠账40元。如今年底近了，不知如何还债，大是窘人！现在两星期竟未到书肆。”（1918年12月13日与王伯祥信；《年谱》p46）清末存古学堂的史学助教沈修（绥成）病逝，身后藏书亟待处理。1921年7月16日他的中学老师、曾任存古学堂经学助教的孙宗弼（伯南）邀往可园选购，买了30余种，俞正燮《癸巳类稿》即为其中一种（见《癸巳类稿》1973年题识）。对书的价格，“以带有贍济性质，故不忍抑价也”（《笔记》卷一p218）。1922年在苏州编杂志目录，“所有杂志约150种，全份者约15种，册数恐在2000以上”（《年谱》p74）。

上大学时，京师图书馆是常去的地方，以清内阁大库所存残书为基础，加之本校藏书，“遂得见宋、元槧本，唐、宋以下古写本暨各名家点校本，凡予所不得偿于大书肆者，咸可摩挲抚弄于阅览室中”。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图书馆职，有了薪金，经常出入东安市场，选购必备之参考巨帙。当时军阀内战，文化教育经费不足，1921至1926六年中“欠薪累累，至斥卖先妻钗钏以供生存，然犹积书盈三室”（见《〈书巢〉后记》）。日记记载1923年8月31日，在青云阁买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蓄意购之数年，今日大胆买之，快甚”（《年谱》p86）。

这一时期，他跟随胡适整理国故，开始搜集历代学者的辨伪著作。1922年在沪买到宋人王柏的《诗疑》，次年春校点完毕。在北京吴虞处借得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1922年12月，在苏州抄出一本。此前胡适在藏书最富之北平久寻不得此书，后吴氏北上，行篋中携有韩城王氏刻本，遂转告先生而借到。他抄后“施以标点，欲重刊之而未能也”（《年谱》p75）。这年秋，还找

到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所藏姚氏《好古堂书目》抄本，并托人代为抄出。此本现藏文库，先生在封面题：“民国十二年九月囑南京省立第一图书馆员代抄”，封里有钐“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朱印的六行字：“好古堂书目壹册计字二万一千八百个合洋肆元叁角陆分 垫购纸洋壹角 邮费贰角 三共洋肆元陆角陆分 除前收大洋叁元 应找洋壹元陆角陆分 九月三日。”以后十年，一直在努力搜求姚氏著作，其中《诗经通论》终于在30多年后的1958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1921—1923年，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胡应麟《四部正讹》、宋濂《诸子辨》，辑录郑樵《诗辨妄》，标点《崔东壁遗书》、《诗经通论》，研究《诗经》的性质、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都是作考辨伪古史的工作，所以到这时笔记几乎成了“古史清一色”了（《年谱》p84）。藏书的重点自然倾向到这一方面。

据《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记载，至1924年接着到京之前，已有藏书二万册。以前分散在京、苏两处，自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教科书来到上海，又分作三处，使用起来十分不便，由是下决心一起搬往北京。1923年底，理苏、沪两处书籍尽数装箱运京，但因寓舍未定，迁移了几回，每搬动一回，就要做十几天的整理。1924年8月终将存放几处的书运归一处，他说：“这十三年中，我的书从不曾统一过，这次竟统一了。”（《年谱》p97）

3. 鼎盛期

先生在1927年4月撰写的《计划书》中说，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所以藏书目的是劝人取其作道德和文章的；现在人目的是增进知识和进行专门研究，根本宗旨的改变，就使恹恹无生气、与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面貌大变，就会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起收来。他把要收集的图书资料分成：经史子集丛、档案、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和个人生活的记载、账簿、少数民族文籍、教会出版物和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

书、旧艺术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图像等 16 类，对各类所包括的内容及搜集的必要性均作了说明。这篇文章把通常重视的经史子集与向来鄙视的俗陋猥琐之书以及新发现的简帛文书、甲骨石经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说明他已具备了现代藏书理念。而此时他个人的藏书情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也有天壤之别。《〈书巢〉后记》中有很生动的描述：“及备位教授，菽水之资十倍于前，则琉璃厂、隆福寺诸大贾咸揣摩其所好，排日送书，惴惴然惟恐不当予意，昔之过门而赳赳者，今乃得恣意评隲而去取之，贫儿暴富，俨若苏季子佩六国相印以归洛阳焉。是时予虽仍悬参考书籍为求书之标的，而凡古本、稿本及鲜见之书亦往往遇之，书库扩充至十室。”曾有文章回忆在旧书店工作几十年的雷梦水先生，谓 30 年代“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等人配书找书”（《团结报》1990，12，5，《古书先生》），可补充他的回忆。1929 年 6 月下旬，他将书籍由景山之西、琼岛之东的大石作胡同寓所，运至西郊的燕京大学（《年谱》p175）；1930 年 9 月下旬，迁家至燕大东门外成府之蒋家胡同 3 号（《年谱》p188），从此“书居正屋而人住厢房，欲查一事，取之即得”（《年谱》p245）。“凡研究先秦及两汉经子及汉以前之中国史者，颉刚所藏纵不能谓毫无缺遗，实已大体完备，等于一个专科图书馆”（《呈教育部信》）。同时城里也有一部分藏书。

这一时期重要所得有：从 1922 年起整理《崔东壁遗书》，至 1936 年正式出版。其间 1927 年夏天在杭州为中山大学购书，在书坊见《东壁先生书钞》，为嘉庆二年本而未经重刻抽换者，于崔著诸本中为最早，“其中视定本差异者在四种中为最夥。大喜欲狂，持之以归，几疑崔氏神灵默护，以报我搜集之勤也”（《年谱》p142）；1935 年 2 月，得广平张文炳寄来崔述之弟崔迈遗书 4 种，抄点，入《崔东壁遗书》，并先将其中有关《禹贡》者辑出，加按语，刊于《禹贡半月刊》（《年谱》p231）。从 1922 年起搜集姚际

恒著作，至1930年2月4日，致钱玄同信，因彼来信告姚氏“《春秋通论》抄本竟为伦哲如买到，大快”，遂借抄之（《年谱》p181）；1932年春，在杭州为燕大图书馆购书，于已故藏书家崔永安家发现所藏姚氏《仪礼通论》抄本一部，“大以为快，即向其借出抄之”，并费两星期工夫校对（《年谱》p201）。此书20世纪50年代被历史研究所购得，先生当年的亲笔题签、未写完的题记、整理手迹、校毕识语等，皆完好无损（见《仪礼通论》“点校说明”）。1933年8月在沪期间，“访得王绶珊藏有方志千数百种，因请介绍，徵得《九峰旧庐方志目》一册，珍本秘籍，洵可宝也”（《年谱》p211）。1935年5月，伯希和来平，托彼带信与时在法国的王重民，请搜集欧洲所藏《尚书》敦煌本（《年谱》p233）。这年夏，为燕大图书馆访购图书，得明本《方輿胜览》一部，其中有利玛窦的《山海輿地全图》，为“三百年来见者绝鲜”，“间有说解，至足宝贵”，因校之（《年谱》p234）。这年秋，为冯梦龙《山歌》作序，称此书为苏州歌谣的大总集，“虽全部是情歌，而范围之广，形式之多，内容之复杂，皆远非《吴歌甲、乙集》或其他歌谣辑本所能及。自从收集歌谣以来，这部书可算是最重大的发见”（《年谱》p237）。

这段时间，他协助其父子虬公搜集家刻本书甚多。1930年8月15日日记中记：“迂客公（顾嗣协）所作《依园集》，前岁得之杭州；所刻《冈州遗稿》，父大人去岁得之上海。今日援庵先生又以新得《玉台集》写本见赠。”1932年5月31日日记中记：“此次到杭，搜得吾家文献如左：1. 迂客公校刻《白沙集》；2. 侠君公（顾嗣立）《桂林集》（初印）；3. 配全《元诗选》初集；4. 侠君公手批《文选》残本；5. 《江左十五子诗选》；6. 有兑书印之《温飞卿集》，到沪又得一种；7. 《元诗选》二集（初印）。”幸运的是，历经劫难，这批珍贵图书都完好地保存至今。有关文库所藏家刻本的情况，详见下文。

从1934年创立《禹贡半月刊》以来，他为禹贡学会的藏书建设也出了不少力。1935年12月，赠书与禹贡学会，共13种39册；1936年1至6月，赠书35种43册；1936年11月10日，与沈兼士合赠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之图书30余种；1937年3至4月，捐赠图书8种9册（分见《年谱》p244、247、262、270）。1936年6月，得知某纸商手中有大批清代档案，即请赵泉澄前往为学会选购。7月，购得4000多斤，3、4万卷，以清代光、宣两朝之档案为大宗。随后学会设专人整理。10月5日，改赵泉澄代作之《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送《故宫文献论丛》（分见《年谱》p254、259）。他计划出版《禹贡丛书》，认为自己收藏的《奉使朝鲜行程记》和《奉使俄罗斯行程记》，是今日研究东北地理最好的资料，拟考订付刊，但最终只有由顾廷龙、吴丰培等人编辑的《边疆丛书》甲集、续编，包括《西域遗闻》、《哈密志》、《西行日记》等13部书出版。

1945年12月他写给教育部追查散失图书信中，对这一时期的藏书情况作了详尽的记述，现摘录于下：

（1）经学子学书：大部图书计有《古经解汇函》，《唐石经》，明监本、粤刻、赣刻《十三经注疏》，《经苑》，《通志堂经解》，《四书五经大全》，《清经解》正续编，《石经彙函》，《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经义考》，《经籍纂诂》，《诸子彙函》，《百子全书》等。零种书中，其家刻初印本有《禹贡合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诗经世本古义》，《三家诗遗说考》，《仪礼释宫》，《三礼图》，《五礼通考》，《读礼通考》，《春秋大事表》，《左通补释》，《群经补义》，《唐石经校文》等；又日本刻本有《左氏会笺》，《七经孟子考文》等，皆精善。拟对于汉代讖纬书作一集录，故此类书搜求最全（或为雇工抄写），自《古微书》以下，若赵氏《七纬》，乔氏《纬攷》，殷氏《正纬》，及蒋氏《纬学兴废源流考》等，凡得七种，其后得明抄本纬书，似为天一阁中故物。

至清末今文家启迪思想甚深，故关于廖季平、康长素、夏惠卿、崔觐甫诸先生之著述，无论宏篇钜著或片纸只字无不收集。瞻顾各图书馆所藏，似尚无对于中国古代文籍之研究作如此系统之收集者。

（2）文字学书：先祖廉军公研究《许氏说文》功力甚深，家藏文字学书最多，清代所刻《尔雅》、《广雅》、《方言》、《释名》、《玉篇》、《广韵》、《繫传》诸种本子几尽备，段玉裁、桂馥、朱骏声、钮树玉、王筠、郑珍之著述亦悉具。其自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说文丛稿》若干篇，手钩有天一阁原藏《宋拓石鼓文》（今存文库），手抄有《汗简》、《六书略》等，家叔（顾廷龙）有过录清代金石家七人所评《积古斋钟鼎款识》等书（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善本库）。

（3）史学书：大部书如明监本《十七史》，清殿本《二十四史》（上两种尚未配全），蜀大字本《史记》，百衲本《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钞》，彭元瑞《五代史注》，正续《宏简录》，《元史新编》，《新元史》，《明史稿》，《九通》，正续《通鉴》，《通鉴纲目》（宋刻明印），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明清《会典》，明清《一统志》，十一朝《东华录》，广雅书局所刻史学书，《太平寰宇记》，《輿地纪胜》，《读史方輿纪要》，《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汪士铎《水经注图》，杨守敬《历代地理图》、《水经注图》，及各种省府县志约二十种。零种有甚珍贵者，如张穆（石舟）《顾亭林先生年谱》手稿，先祖手写吴中掌故丛编，及东壁先生书钞最早本。历代文物图像搜罗亦众，有《博古图录》，《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金石萃编》，《金石索》，《怀米山房吉金图》，《恣斋集古录》，《铁云藏龟》、《藏陶》，《殷虚书契》，《殷文存》，《龟甲兽骨文字》，《古玉图考》，《权度量衡实验考》，《金文丛考》，《世界美术全集》等。当时海外学人如伯希和、高本汉、戴闻达、桑原隲藏、新城新藏、白鸟库吉等，及本国各史家著作，无论整书单篇，集有六七百种。至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南京国学图书馆、中国营造学社、西北科学考查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机关之出版物，凡关于历史者均有其全分。

（4）文集及笔记：此类书附带搜集，时遇佳本，如明刻本之《鸟鼠山人集》，稿本之亢树滋手写诗文集，批校本之清代某家精批《文选》，钞本之《王静安先生笔记》（未收入其全集）等皆是。其大部者有《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唐人五十家小集》，《宋文鉴》，《南宋文范》，《宋诗钞》，《辽文萃》，《元文类》，《元诗选》，《元曲选》，《明诗综》，《小檀栾室闺秀百家词》，《碑传集》正续编，《太平广记》，《明人百家小说》等书。

（5）丛书及工具书：为治学之方便计，此类书籍亦尽量收集。计明刻本有《玉海》（三朝本），程何两刻《汉魏丛书》，《艺文类聚》等。清及民国初年刻本，有抱经堂、经训堂、士礼居、二酉堂、知不足斋、平津馆、岱南阁、惜阴轩、湖海楼、功顺堂、滂喜斋、咫进斋、灵鹫阁、花雨楼、式训堂、铁华馆、怡兰堂、训纂堂、问影楼、峭帆楼、又满楼、吉石厂、曼陀罗华馆、海山仙馆、集虚草堂、广仓学窘诸家所刻丛书，及《汉魏遗书钞》，《汉晋地理书钞》，《佚存丛书》，《古逸丛书》，《国粹丛书》，《湖北丛书》，《安徽丛书》等。其一人所著之丛书，又有杨慎、王夫之、黄宗羲、毛奇龄、钱大昕、洪亮吉、焦循、袁枚、俞樾、沈家本、丁谦、章炳麟、王国维诸家。类书有《太平御览》，《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图书集成》等。至工具书方面，若年代表、地图、字典、辞书、书籍索引，均一见即收。尤以书目一项，自《天禄》、《四库》以至各图书馆、各藏书家、各书肆，凡有可求，无不罗致，求而不得即雇工借钞，故几于齐全也。

（6）报纸杂志及近代史料：近百年为中国蜕变之期，政治文化皆呈新旧交替之色彩，基于观变之好奇心，一纸不肯轻弃，以是所积弥多。官报如《谕折彙存》、《政府公报》，政治性之杂志如

《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甲寅杂志》，文化性之杂志如《湘学报》，《译书彙编》，《东方杂志》，《国粹学报》，《中国学报》，《新青年》，《新潮》，《科学》，《学衡》，均系全帙。此外清末杂志，足以表见革新之精神者，如《大陆》，《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杭州白话报》等，虽未完整，亦皆备有。报纸自民国十年后，凡订阅之《申报》，《晨报》，《时事新报》，均按月装订保存。近代史料，以故都为昔日政令之所自出，各方政论之所萃，出版物特多，而时过境迁，人家不存，书肆不售，都当作废纸，散列地摊。住平二十年，每有瞥见，恒检拾以归，分类装入书套，分为维新、革命、立宪、帝制、复辟、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九一八事变等部门。其中如日本人之《支那分割之运命》，辛亥革命时之告示，袁世凯排斥国民党之小册及其《居仁日览》，古德诺杨度等之《国体论》，皖系军阀之《三国还魂记》，是尤为可贵之直接史料。至于清末政治论文，若各种《经世文编》，《盛世危言》，《变法平议》，历次公车上书记，及王韬之各项著作。文化方面之撰述，若《格致古微》，《地球韵言》，蒙学课本，文明书局出版之教科书全份（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之前），及广学会、作新社、广智书局、江南制造局等处之新学书籍，亦皆搜罗。他处图书馆中，似未见有此齐全之中国近代史料也。

（7）社会史料及家庭史料：因注意近代社会之变迁，凡耳目接触之材料而为其所有者，虽无实用，俱不毁废。先祖先父所遗之科举材料，如童生举子之试卷、硃卷、窗稿、书院试卷、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等选本，诗韵，类书。儿童读本，如《幼学》《鉴略》，《增广贤文》，《圣谕广训》，《女四书》，《女孝经》，各种诗古文选。社会流行者，如旧小说，剧本，弹词，唱本，故事书，宣卷，劝善书（每至一地，即访当地小书肆，将其所出小册购一整套，以苏浙闽粤冀五省为最多）。家庭积存材料，如家谱，家用

账簿，礼簿，彙目，讣闻，寿启，均一一保存，为研究社会史之直接材料。此等材料占有四架之多。

大致算来，共有明刻约 100 种，清代精刻约 200 种，日本旧刻约 60 种，钞本批校本约 50 种，稿本约 70 种，其中绝版书及孤本书甚多。

去年我们发现了一批不同时期先生的藏书目，除了《京舍书目》为他亲自编订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两本，为殷夫人（履安，卒于 1943 年）抄录。其中一册（今称《成府藏书目》），记载了 21 箱、4 橱、3 架图书，全为四部古籍，约 800 种 9000 册，很多明刻本及清代精刻本、原刻本、家刻本，有许多是批校本，推断为 1937 年以前在成府的藏书，大约是“书库扩充至十室”中的一部分，于鼎盛期的情况可见一斑。另一册写明为装箱待运之书，先生在册后写了约 300 字的题识（今称《待运书目》）。它应当是 1938 年殷夫人赴云南前所成，大概由于时间仓促，只记书名和册数，其中有“原拟卖与学会之书，仍装箱存成府”一项，共 197 种，书 823 册、图 227 张。学会即禹贡学会。最终没有卖成，有些现还在文库中，如 80 册《苏州府志》、6 册《周庄镇志》（这部书的得失情况详见后）等。

4. 散佚期

作为一名学者兼藏书家，这是先生经历中最为惨痛的一个时期。我们仅以时间顺序叙述之。

1937 年 7 月 21 日，只身离平赴绥远，“至于家属，暂留北平，如予必不能回平，再全家南迁，书籍什物则分存成府、禹贡学会两处”（《年谱》p277）。当时禹贡学会在城里西四附近。10 月 17 日，在兰州始识张维（鸿汀），对其所修《甘肃通志》甚赞之（《年谱》p279）。文库现存张维编撰的《甘肃通志凡例》、《甘肃人物志》，都钤有张氏印章，应为当时张氏所赠。1938 年 9 月 2 日，与梅贻宝同访西北耆旧慕寿祺（少堂），彼著之《甘青宁历代大事

记》“凡文籍所载与见闻所接莫不搜录”，“求文献于陇右，必数三君焉，曰慕先生少堂、张先生鸿汀、邓先生德舆”（《年谱》p288），文库所藏有关西北文献如《襄武人物志》，为1938年4月27日赵心柏所赠；《创修渭源县志》，为邑人周生若所赠；《西宁府新志》，为马霄石、姚钧所赠；《西宁府续志》，为1938年8月24日青海省政府所赠。1939年任云南大学教授，元旦，迁家至昆明郊外浪口村。由于携书绝少，为应付功课，不得不购。两个月来，“撙节薪金，得法币400元，持入市，买缩印本《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于世界书局，买《二十五史》及其《补编》于开明书店，买《四部备要》零种于中华书局，买《国学基本丛书》于商务印书馆，居然盈两架”（《年谱》p292）。于此也可见虽在战争时期，生活秩序被打乱，但书局印书、书店卖书、学校教授，文化生活仍在易地艰难地进行。本年7月6日在昆明登华街见到钱穆，得其见贻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据顾廷龙先生言，此为钱氏出资排印，印数极少。8月22日，又于此地得陈槃（槃厂）、王崇武（之屏）两君所赠之四部备要本《经义述闻》。纵观他在西北西南得书，多为普通排印本古籍以及乡邦文献。据方诗铭回忆，胜利后文通书局编辑所设在苏州（即在顾家花园先生寓所，由白寿彝主持日常编辑事务），先生慨然将藏书“提供给编辑所，同人们可以自由使用。这里有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大部头的丛书，还有大量的古籍（应主要为子虬公的藏书——撰者注）。”（见方诗铭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燕大，他预感“予存校书籍、稿件、什物，恐将不可问”（《年谱》p308）。1946年5月15日，他在上海见到《待运书目》，题记道：“予书在平，自民国二十四年后分两部：一在城一在郊。此在城者也，以史学书为多。二十六年卢沟变起，予仓促离平，履安为予装箱寄存同乡汪孟舒君处，即此目所载者是。其在燕京大学者，由起潜叔存

入司徒校务长所居之临湖轩。自日美宣战，燕京一部遂不可问，而孟舒已迁寓，予书改存李延增君处。今年二月到平，入李君室，见予书装箱，封识宛然而履安已渺，为之雪涕。……兹来沪上，起潜叔出此册，是履安交之保管者也。越八年而至予手，悲哉悲哉！”册中所录共计15箱，约1300多部万余册书。另有一项为“成府装箱目录”，计有455部，4300多册，经过我们编目，发现大部分都在，其中有大部头书《通志堂经解》（著录417册，现存480册，数目相去不远）。这批“成府装箱”之书保存下来很是难得，有可能是七七事变前已运进城里而幸免于难。由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留下，当事人又都已离世，故只能是推测。城里之书虽损失较小，亦有散出者，如《峭帆楼丛书序目》一册，是1996年春由钟敬文先生的一位学生从旧书店买到的，看到书里先生的藏章，托钟先生送给我们，在此书“丛刻总目”页上还有先生的批语。

留在燕大的书，大致去向为：一部分到了日本人所办的近代科学图书馆；一部分流散于民间，又流向北京各古旧书肆（详见下一段）。在这篇题识上，先生估计“已失三之二矣”，这是1946年的估计，经过以后数年的寻找，又得到一些，但损失1/2，应该不是夸大的数字，其中善本书损失更大。由于《待运书目》一般无版本著录，故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损失的情况。参照他50年代初购书目的记载，于损失情况略可窥见一二。如《皇清经解》321册、《续经解》320册，皆散失，现存为1951年从北京来薰阁重购；董增龄的《国语正义》亦重购；日本元禄本《大戴礼记》、《顾亭林先生年谱》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廉军公手写《吴地记》、《吴风录》（是否即吴中掌故丛编？）及东壁先生书钞最早本现存文库。

5. 重聚期

重聚期的活动，可用四个字概括，即：寻、捐、买、卖。

日本投降后，廷龙先生即函告藏书下落，有1945年9月1日、18日、11月13日、18日、12月1日、1946年2月1日6封信的

记述为证。除上述部分，又托故交章元群，以稿件较整齐者代寄中国银行仓库，曾被日本军部拍卖，由章氏赎回，即请叶揆初先生托人存入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信中还记从聂崇岐处听说：“存临湖轩者在华北综合研究所未成立前已为倭贼盗运一空，存四楼者尚有一部分保存。”推测在临湖轩的书当整个存北平，未必携回日本。带着这些线索，先生于1946年2、3月间赴天津接收存于浙兴银行的稿件。之前于2月7日，嘱人刻印二方：“颉刚劫后所得”、“晚成堂劫馀书”。实际还有一方“颉刚劫馀藏书”，款式大小与前一方相似，不知刻于何时；而后一方钤印较少。当木箱打开，日记、笔记、游记、信稿皆“一一呈于目前，热泪夺眶，若获亡子”（《年谱》p324）。

1946年2月上旬，他到北平寻书及旧稿，根据日记，所到之处有：东厂胡同教部特派员办事处（主要是零散书及普通书）；禹贡学会（“尘封四年，往整理时，如入埃及古墓，书稿为鼠啮者亦多”）；中法银行（履安检理之稿件信札）；王硕辅姨丈家（从天津运回的日记等）；隆福寺修绠堂书肆、东安市场的中原书店、五洲书局（零散书）；燕大化学楼（残存书）；天津浙江兴业银行（稿件、日记）。由此他分析，在郊外的书分存临湖轩地窖和四楼两处，前者为日军1821部队经理部劫去，时间大约在1942年春，今不知何在。后者被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取去，1945年春间散出，去向主要有三：燕大图书馆、日本大使馆（被教部特派员接收，存东厂）、为日本人中国人所盗（流入书肆）。

2月21日，由谢国桢陪同，在修绠堂找到《古玉图考》、《铁云藏龟》等20余套书，店主人谓是去年春收得，“知为予书，故未售出，其意甚可感也”。3月10日，到东安市场访书，“得予旧藏《诸子平议》一部”。3月6日，到中法研究所参观图书馆，“亦见有予《痴华鬘》等，谓去年于西单购到者。所君欲还予，予不受，以其已出钱也”。最近发现他在“文革”期间的思想汇报《自

省录（二）》中回忆道：“散在图书馆的可以凭我的印章、题签、批校等证据而收回，其散在各书店的则不得不备价赎回，而我带钱不多，因此就托吴丰培向中法实业银行接头，请他们凿开抽屉，取出金饰，换成货币，重买我失去了的书。”这里金饰当为殷氏夫人的，足见其寻书的艰难。

在寻书同时，仍不忘买书和收集资料。2月11日，“在（东安）市场中见日文书甚夥，日人所编词典甚大，所印书画甚精，惜予无钱，不敢买也。然今日收此类书实是一机会，盖文化界人多未归，价不能遽涨也”。2月16日住禹贡学会，冯世五来谈，“日本各机关文件，烧去固多，散出亦不少。冯世五前为何其巩收购，今日来为予道之，予嘱其亦为我收些，亦看其调查统计工作及组织方法”（以上引文均见日记）。后捐给上海合众图书馆的书里有不少此类资料，应是此后所购。

寻找回来的书还有：《孔子改制考》，30年代被丁文江借去，丁君死后，不知流落何所，先生自己也忘记了。战后政府整理敌寇劫掠之书，1946年8月在南京中央图书馆找到，由修绠堂主人代为取回。明代抄本《礼纬含文嘉》，1946年得之于东方图书馆，“以所置之柜有颉刚藏书字，犹得璧返”（均见该书题识）。

1946年5月中旬回苏州故里，子虬公的图书古物被毁亦惨不忍睹。汲古阁《十七史》（60年代初卖掉，详见后）、《唐昭仁寺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正续《弘简录》等均被白蚁咬坏，“倘予再不归来，父大人遗物将不可收拾矣”。而《清仪阁金文》、《攬古录》、《西清古鉴》等，均有匣无书，怀疑被盗。子虬公所藏《诗人玉屑》、《词苑丛谈》、《苕溪渔隐丛话》、《本事诗》、《随庵徐氏丛书》、《金石聚》、《金石文钞》、《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嘯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集部和金石书现都存文库，而所失之《攬古录》、《金石图》、《金石索》、《西清古鉴》等，于50、60年代重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怀旧情结。1947年

3月2日，在苏州沈勤庐处看书，“则我父旧藏之程敦《秦汉瓦当文存》在焉，渠得之于秦川书社，价万二千元。又予赠健常（谭惕吾——撰者注）之英译《古史辨自序》亦在，得之于皮市街书肆，价数千元耳”（以上引文均见日记）。证实了有人偷盗的推测。《秦汉瓦当文存》，1950年重购于修绠堂。

1946年夏整理子虬公在苏藏书。1946至1948年，他的藏书陆续从重庆运回苏州，从北京运回上海。随即请人晾晒、进行编目、重新上架。原有之《十国春秋》，不是全本，由苏州书贾杨福堂帮助配齐；1948年，北京劫余书籍海运至上海，因屋小不能容，置于堆栈，“四九年夏，黄浦江水大涨，若干箱书没于水中，此书亦在淹中，故有水渍云”（见该书题识），称“此又一厄运”（1949年7月26日日记）。这年8月理书时，念及其藏书遭受兵灾、水灾，兼以盗窃、邮寄遗失、白蚂蚁蛀食，损失甚多，感叹道：“‘多藏厚亡’，此之谓也！”（1949年8月10—11日日记）

1949年春，在沪理书的同时，考虑到房屋狭小，存贮困难，同时自己年近六十，精力不济，遂将有史料性者捐入叶揆初等人创办的、顾廷龙经管的合众图书馆。这类近代史料和杂志有两千多册，其中确有许多孤本，“皆彼馆所未备，喜得其所。予自幼过书摊必拾得一些归，而不知正为合众积也”（1949年4月5日日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日记里数次记载王煦华等人到苏州家里整理图书、报刊、碑帖，备捐。王煦华回忆道：1952年11月，顾先生“和我去苏州老家整理藏书一个星期，将抗战时期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都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在此之前顾先生捐赠给合众的书，曾编印过一本油印的《顾颉刚先生藏书目录》，但这次捐赠的书刊报纸，只有我开的清单，遗憾的是以后没有单独编印成书本目录”（见顾永新文）。文库现保存着这本油印本书目，共计约书860种2400余册、图若干幅。其中许多近代史料，即为上引致教育部信中所记；另外清末民初之章程、报告、概况、传记及河工、

海防等工料、薪粮、公费清册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抗战时期内地出版物及期刊也有若干。还有1938年毛泽东寄赠之《论持久战》，一直跟随他辗转西北西南，这次加以题跋，送与该馆（见顾廷龙文）。又王煦华先生面告：“还有少数合众所缺的古籍，亦应廷龙先生之请，而捐给合众，如油印目录中之《续礼记集说》。1979年先生为了从中辑出姚际恒的《礼记通论》，就命我向上海图书馆借来辑录了。还有，他对学生的治学极为关注，知我治《方言》及搜集国民党禁书史料，1954年北迁前，即以钱铎的《方言笺疏》和《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1929—1935）（此书现存上图特藏部）赐赠。”

举家迁往北京后，1958年春，在筹备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时，将所有之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物检齐一份，约一百数十册，赠与民间文艺研究会（《年谱》p363）。

这一时期所买之书，有失而复得者。《周庄镇志》为民国初年友人所赠，携至北平，与方志书放在一架，战中失散，1947年冬，吴玉年（丰培）在书肆中得到，“审为予旧藏，购以邮予。此一书也，得而失，失而复得，可谓大有因缘，不可不记”（见该书题识）。1947年买大部头书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一部，价100万元（1万元等于后来的1元）、《汉学堂丛书》一部，价140万元、《古经解钩沉》一部，价10万元。

1950年，到上海甘家（未记人名，大约是一收藏家）看王彝、蜀大字本《史记》、瓷器等，谓蜀大字本《史记》“即在待焚中救出者也。至今日，则善堂虽无收买之力而纸厂兴，收作还魂纸，南北书籍之毁于纸浆者已不知其几何矣”（5月22日记）。50年代初，收购古籍论斤卖，李拔可（宣龚）、曹元弼（叔彦）等人身后之书都没逃出这个命运。李为光绪举人，曾助张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任经理多年，1952年歿后处理藏书，其中明刻本44种，逐部标价，共约875万元，但须觅受主；普通本只可论斤，整部

书每百市斤 20 万元，零星书每百市斤 12 万元，约计 10 担左右，即 1000 斤。又《四部丛刊》初编至三编全套，如可由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购进，大约有八、九百万元可售。又百衲本《二十四史》可售 100 万元，其书箱亦可售 100 万元。柚木书橱 4 架，估价 100 万元。对此，他的评价只两个字——“惨矣”（见《笔记》第四卷 p2686）！曹曾主江苏存古学堂，被他称为“一代经师”，然 1953 年秋去世后，苏州文管会中人谓其：“绝无好书，只可作废纸论价，全部价值仅 200 万元。”（见《笔记》第五卷 p3705）1954 年春，他与陈子展、胡厚宣、马长寿、范祥雍、章巽同到苏州曹元弼家买书，曹家藏书苦不得售主，因此邀诸友往观。“予宣言于众：曹家书，诸君要的我即不要，诸君不要的都归予。盖虑予如不要，又将卖与纸厂作纸浆也。如此，予得书可五千册”（1954 年 3 月 22 日日记）。现文库中钤有“曹元弼校藏经籍印记”之书，应为此次所得。又曹氏晚年以目疾，必读之书皆令人写大字，他认为：“此甚适予晚年读书，故予选者独多。”（1954 年 3 月 21 日日记）文库现存此类书 270 余册，以经部书为多。

此时，因书源充沛，颉刚先生买到不少好书。《水经注》40 卷，乾隆十八年新安黄晟槐荫草堂刻本，1952 年得于苏州。据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回忆：“建国初期，常熟丁祖荫淑照堂藏书散出，我曾收得善本数十种，其中有一部《水经注》是乾隆时天都黄晟刻本，原衬订二十册，曾经桐城姚元之用朱笔校注，并有印记。顾老看到后，爱不释手地要求买回去。但又提出能否分两次付款。我们同意了，他感到很高兴。”（见江澄波文）1953 年同样得于苏州文学山房的还有《麟经指月》12 卷，为冯梦龙所撰，明泰昌元年麻城开美堂刻本，为“吴中罕见”，“此书讨论《春秋》制义作法，虽今无用，亦见科举时代之风尚”（见该书题识）。抄本《史记疏证》，1954 年以 18 万元得于上海修文堂书肆，“苑峰（张政烺）见此，谓是宿迁王氏故物”（见该书题识）。由于是孤本，为日本

《史记》研究专家水泽利忠所重视，1991年特照相复制一部。1954年还购到抄本《汉书疏证》一部，“取校日本昭和十四年吉田幸次郎等缩印本，笔迹校若画一，知出一人之手；而挑逗长短、笔画繁简又略有异，知为一人前后所书也。此书不著撰人名氏，而当时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刘先生（庐江刘晦之，此原为其所藏）同时得两本，洵显晦有时矣”（见该书题识）。清人顾禄的《题画绝句》，为道光时茶磨山馆自刻本，在他1915年2月自订的《藏书草目》里有记载，是为幼年所得。1954年又从来青阁买到顾氏的《桐桥倚棹录》，亦为道光本，“盖刻版十余年后即遭兵燹，流传至寡也”（见该书题识）。此书先由来青阁主人杨寿祺在1953年送到江苏文物管理委员会，因索高价，会中无力购买。第二年“苏州诸友知予好搜罗乡邦文献，怂恿予购之”（见《题画绝句》题识）。1975年前后，友人助之送琉璃厂，将两书同以金镶玉之式样装裱，合成一函。还有得之于苏州的道光本《吴趋访古录》、得之于北京的嘉庆石研斋本卢重元注《列子》，都是较为少见的本子。所以1963年他有感而道：“初以为予家书籍，抗战前所购为多，近日理书，乃知实以战后所得，质、量两方俱高于战前。”（是年3月25日日记）古籍之外，还买了许多现代理论书。1948年在上海大中国图书局门市部买书，“沪上所出唯物史观各书，予向少观览。今以教中国社会史课，不得不观，且甚愿以此酝酿一部通史，故亦乐为之。今日在局购书56万元，皆此类也”（是年1月5日日记）。

这一时期，他与书商之间是信任和互助的关系。文学山房得到好书，他介绍给上海图书馆或者专家购藏（见上引江文）；文学山房江氏父子积累明刻残篇160种，分别部居，装成三十余帙，他为之写序（文库即藏一部）。而书贾则将手中一些零散珍本书送给他，1951年文学山房赠给他顾嗣立《闾丘诗钞》、顾禄《颐素堂诗钞》，一册残本四库原钞本《备急千金要方》，在今天就更显珍贵。1954年6、7月间，他准备北行，整理书籍装箱，请江澄波代理包

书运物工作，“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 225 箱，……平均以 400 册计，已 9 万册矣。如在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 12 万册矣”（1954 年 7 月 20 日日记）。

到北京以后虽然时常到东安市场、隆福寺等处买书，但已不如建国前后的数量大了，而且多有卖出。

由于家中人口多，支出过大，1955 年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一部以 180 元之价卖出，似为卖书之始（见 1955 年 8 月 24 日日记）。三年困难时期，家用更加入不敷出，1960 年 1 月开始整批售书。第一批卖给中国书店的书有：《李氏藏书》正续，32 册，150 元；《广雅丛书》420 册，400 元；《历代诗余》40 册，100 元；《艺文类聚》36 册，70 元；《每周评论》1 册，72 元（见 1960 年 1 月 4 日日记）。并记道：“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值兹劳动力极端缺乏之际，我一人之力亦不能维护并检取此五万余册书，故决取不需要者售出。”“此种书随我三四十年，临别时亦不无恋恋之情也。但祝物得其所，使用率加强，于学术界有裨益耳。”同月 23 日，理出复本书百余部，汲古阁《十七史》零种每册仅合 2 角，“可见线装书价今日尚不高。予为腾出空箱，俾存书易于整理，只得接受”（当天日记）。此年春，陆续理书出售。4 月 27 日日记写道：“静秋捐出大书架一、书柜一于本胡同人民公社，招孔繁山（中国书店职员——撰者注）来，将若干大部书如《新元史》、《新旧唐书合钞》、《晋书校注》等书出售。”“此次卖出书籍，得五百元，欲买进一电视机，尚不足也”（1960 年 4 月 30 日日记）。一部康熙版《御选唐诗》，开化纸套版印，15 厚册仅定 15 元，“真足使藏书者短气”（1960 年 5 月 7 日日记）！此年 10 月，售书 227 种，作价 820 元，“比售进之价差得多了”（1960 年 10 月 24 日日记）。应允中国书店“将集部出脱，然吾父爱文学，集部佳板皆吾父所购，今听掷诸不可知之地，颇为伤痛”（1960 年 10 月

22 日日记)。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有全部出脱,今存文库的集部珍本,在全部珍善本中大约是最多的。一部《四库珍本初集》千余册卖 500 元(1960 年 12 月 1 日日记);一部五局刻本《宋史》,100 册、初印,只卖 8 元(1961 年 3 月 5 日日记)。那时,以个人经营书业者不多,“萧新祺是其一,时有旧版可意书送来,予以他书易之。今木版书已停售,渠已派至乡间劳动,听孔繁山言,回来后亦将禁止其营业矣”(1961 年 3 月 5 日日记)。1961 年 1 月 3 日萧新祺来家,“观其所送庄有可《慕良杂纂》及阎若璩《潜邱札记》”(当天日记),今文库所存,当是与其易书所得。然而这种便通的方式很快也不复存在了。1961 年秋售书所得为 304.30 元。这年 12 月 26 日日记记载:“本月 20 日收中国书店书价 319 元,到今一个星期,为了买物(鸡蛋每个 6 角)、医病、请客、订报、寄钱(三姨处 40 元),到今天已用完了,不得不再卖书。”生活的窘迫可见一斑。1962 年 7 月 5 日,将 1954 年在苏州买得方苞女婿王金范乾隆三十二年所刻、乾隆五十年郁文堂重刻本《聊斋志异摘抄》(有王芑孙的评点),卖与文学研究所,得 200 元(见当天日记)。11 月 11 日卖出重本杂志后,到东安市场将上月见到的、书价 8 元而囊中羞涩没买的、1926 年排印本《坚瓠集》“急买来,幸尚未为人捷足先得也,此书中甚多苏州掌故”(当天日记)。可见当时他还在买书,大都为普通本子,并且是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书。

1962 年秋,先生拟将藏书全部卖与中华书局。10 月底,拟《卖书与中华之愿望》800 字。以后多次与姚绍华谈卖书事;此前检出寿山石三方,托孟默闻刻藏书章,“请刻先祖先父及予藏书图记,以资区别,亦为百年收藏之纪念。纵不能终保,亦以告之后人,知我三代积累之辛苦也”(1961 年 9 月 25 日日记)。最终大概由孟转请罗福颐刻印三方:“先祖廉军公收藏书籍颉刚记”、“先父子虬公收藏书籍颉刚记”、“吴县顾氏纯熙堂书库”(见《印选》)。1963 年上半年,先由他分别祖、父、自己三代所藏,然后请人逐

册盖章；并请人编出一目。1964年夏，把《禹贡半月刊》纸型交给中国书店，“果能翻印数百部，供民族史及疆域沿革史者之参考，亦一佳事”（1964年6月8日日记）。1965年秋，在做结肠息肉手术前，立遗嘱道：“我家三代藏书，经历抗日战争的损失和解放后的捐献，尚存五万余册。……我的意思，这批书由中华书局购下最为合用。如中华不能全购，也希望由他们先行挑选，再求他主，最好不要分得太零碎，泯灭我家祖孙三代积存的苦心。”大约以后不久，卖书事被历史所领导制止。“文革”初期，家中书库被历史所红卫兵封，以防他处来抄。“在运动终止前，予遂不得随意看书写稿”（1966年8月22日日记）。1969年10月下旬，“为备战，所中人来书库检善本及地图若干去”。1970年夏，历史所将取去的书送还一部分（见《年谱》p388）。1971年春，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先生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书库随之启封。这一年读古籍，略理书库中书（《年谱》p389）。1973年，向历史所索还1968年取去之笔记稿件，“加以检点，颇有缺失”（《年谱》p390）。1975年，大量阅读古籍，作题跋（见《年谱》p392），从上海图书馆所编《历史文献》第1—4辑连载的《缓斋藏书题记》中，可见许多是这一年题写的。1995年春，军事科学院的常富春同志告知，1972、1973年间在中国书店所买到先生的《古代地理丛考》的钞件，由此可知“文革”期间仍有书稿散出。

以上按时间粗略叙述了顾颉刚先生的藏书经历。一生积书，聚而散，散而复聚，看似纷乱，其实聚散有时。像他这样的学者兼藏书家，在现代恐怕只有陈垣、郑振铎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认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自五代至于清末，记载了大量藏书家，若有续写之人，“倘将以我辈殿一军耶”（《〈书巢〉后记》）？

（下期待续）



吳郡顧氏藏書



貞白藏善本書



貞白校訂金石之印記



顏剛劫后所得



吳郡顧氏珍藏書籍



古吳顧氏顏剛珍藏



顏剛劫餘藏書



貞白手鈔書籍



顧顏剛藏書之記



晚成堂劫餘書



吳縣顧氏純熙堂書庫



先祖廉軍公收藏書籍顏剛記



先父子虬公收藏書籍顏剛記